

近代学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努力

张申 信瑶瑶

19世纪的全球化浪潮给当时的中国带来剧烈冲击,随即,外国的经济学说便被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看作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经济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向西方学习”由此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学术发展的一条主线。该过程中,部分中国学者并没有止步于被动地接受知识,他们主动学习,积极主张实现舶来经济理论与中国本土的相互融合,从而开展了一系列的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探索尝试。

中国经济学的提出和探索,早在近代就已现端倪。彼时,中国经济学术的发展演进虽然以经济学说的西学东渐为主要动力,但已产生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明确学术愿望。之所以言其明确,是因为相关探索并非作为中国经济学之可能的理论铺垫,而是重点表现为对原有理论的中国化应用和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事实上,这一时期已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体现出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觉,试图基于中国本土立场,探索出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具有一定科学性和独立性的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

回顾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可以勾勒出如下的演进轨迹: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诉求在学界产生,并出现了“中国经济学”的明确提法。李权时曾于1929年写道,自己撰《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目的在于“制造国货”,而中国经济科学的目标,应在学习外来学说并将其“国货化”的基础上,“要把国货精益求精的去改良发明,终要设法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才好”(东南书店1930年版,三版自序)。不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顾寿恩于1931年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2卷第7期发表《中国经济学的时代背景及其特征》,本着“中国总该有中国的学问,中国的学问总该为中国而用”的学术理念,论证并呼吁“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学”。只是在当时,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尚未更为广泛而深入地展开。

进入1940年代,受“学术中国化”思潮影响,中国经济学的相关探索较之以往更为频繁。1942年第1卷第11期《大学月刊》以“经济科学中国化问题”专栏,探讨了“中国经济学”“中国财政学”“中国金融学”等问题。同时,学界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民生经济学研究,并因很多学者将其等同于中国经济学,民生经济学也成为了该时期中国经济学在汲取中国传统

经济思想、吸收舶来经济学说时形成的一个具体落脚点。更具有典范意义的是,王亚南自1940年代就中国经济学问题持续钻研,并于1946年出版《中国经济原论》,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代表之作。

回望近代中国经济学界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上所做出的诸多努力,可以发现这些探索不仅形成了中国经济学的正式提法和学术成果,而且在应该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上也多有阐述,对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的探索具有开创作用,于今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此过程中,很多研究都以这样的问题为出发点,即,为什么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必要性和科学性为何?相关观点可大致总结为三类,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经济学须基于时代背景,已有经济学说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

近代中国经济学人中持此种观点的最为多见,他们主要是从经济学的基本属性出发,主张经济学必然应立足于经济生活产生的具体背景。留学德国的马哲民在1944年发表于《大学月刊》第3卷第2期的《“中国经济学”导言》中指出,以经济生活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除却在具体各应用经济领域的研究,应包括两大部分,“一为经济生活之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一为以现实的或特定的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经济学,或简称‘经济学’,而经济学的任务,则是‘从现实的或特定的经济结构中,揭发其固有性或特殊的法则性’。可见,在他看来,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结构、或称服务的对象,必然受‘现实的或特定的’所约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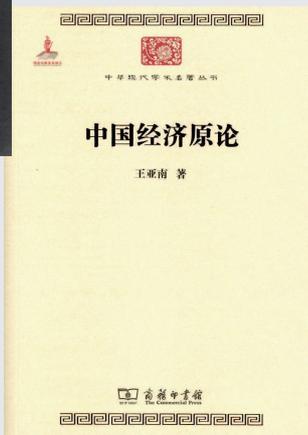
正因如此,马哲民认为,产生于西方经济社会的现有经济学说不能充分对接中国经济问题。例如,以自由放任为核心思

想的经济学说,在中国缺乏“发展工业资本之客观条件”,而历史学派所要求的保护主义,却在中国因“外受帝国主义之压迫,内无开明的保育国民经济之发展的政权”而无法推行,等等。所以,不能“按照别人的公式或概念,用作金科玉律,而以中国的材料去‘生吞活剥’的或‘东拼西凑’的装潢点缀”,更不能“完全用任何解释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经济生活之经济学,来解释我们中国的经济生活”。他由此主张:“我们的经济生活,实自有特殊性,决不能以现有之欧美资本主义国的经济学来说明的;我们假使承认科学须基于事实或实际,我们当然应该以这种经济生活之事实为根据,以创造一种经济理论;而我们亦只有以自己的经济生活为根据所创造的经济理论,才能说明自己的经济生活。”

留法归国博士黄宪章持与马哲民类似观点,不过他主要从经济学说发展史的角度论证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意义。他在1942年发表于《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的《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的目的是在于理解人类社会之经济历史发展之一般法则及各民族经济历史发展之特殊法则,解剖现存世界经济体系和各民族现存的特殊经济体系的内容,并探求未来世界经济进化和各民族经济进化之殊途同归的趋势。”而经济学说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从纵向来看,自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围绕“家室生计法则”提出“经济”这一名词,到重视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兴起,再到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出现等等,所反映出的,都是经济学说演进对人类经济社会演进的亦步亦趋。从横向来看,德国兴起主张保护主义的历史学派,全因其已丧失发展资本主义的先机,而美国因大规模的农工业生产均较为发达,因此形成了有关科学管理法、产业合理化等的相关研究,“可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虽然主要地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所规定。但各民族经



王亚南自1940年代就中国经济学问题而持续钻研,并于1946年出版《中国经济原论》,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学探索的代表之作。



济特性之地域的影响,也不能不加以特殊的考察”。

与此同时,黄宪章也梳理列举了中国现有的经济学著述,指出其反映出的现状为,“中国现有的经济学,只是欧美各国之文化的传播,一般经济法则的灌输,和参考资料的蓄积而已”,“对于中国经济特性的分析,中国经济机构中之特殊法则的发现,以及对于中国经济独立自主之革命的需要和建设的方针之推论与指引,还没有完成正确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他主张,应该创造相应的“中国新经济学之体系”,用以“理解本国民族经济史之发展的特殊法则,解剖本国现存经济体系的内容及探求本国未来经济进化的趋势”。

前文提到的顾寿恩则主要通过强调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来凸显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他将“中国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总结为三点,“民族经济的落后,世界资本主义之发展,与帝国主义对我国之积极侵略”,继而分析道,“帝国主义对之积极侵略,是我国民族经济落后与世界资本主义之自然结果,然而却又足以促进前者作用的显露化,使中国民族经济因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益趋落后;

世界资本主义因足以缓和其国内的阶级斗争之故,而益趋发达。因此两者之结果,遂更深刻其侵略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时代的产物”,中国经济学须相应地具备三大特性,“发展国家资本以挽救民族经济之落后,节制私人资本以防止资本主义弊害之发生,对外保护民族资本以反抗帝国主义之侵略”。在他看来,已有经济学说皆无法满足上述的具体需求,创造中国经济学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

中国经济学是针对不同样本的科学研究,有助于发展广义经济学

在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探索上,王亚南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这不仅是他通过《中国经济原论》的具体研究,揭示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质和症结,也在于他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中国经济学”这一范畴。1941年,